

印度海外移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理论启示 ——以印度“海外公民计划”的整合性分析为中心

孙亚赛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 北京 100007)

[关键词] 印度; 海外移民; 移民政策; 文化认同; 侨务政策

[摘要] 论文系统梳理和分析了从印度裔外国人卡到双重国籍尝试, 最终定型为印度海外公民卡的政策演变历程及其内在动因。印度通过法律规避策略, 在宪法禁止双重国籍的框架下实现了海外印度裔的实质性国民待遇。这一政策创新以“大印度”民族观为意识形态基础, 巧妙利用印度独特的后殖民遗产与国际环境, 构建了跨越主权边界的“文化公民身份”。印度海外移民政策更具法律弹性和身份包容性, 其成功经验对全球化时代我国的侨务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26)01-0036-08

The Intern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India's Governance of the Diasporic Communities: The "Overseas Indian Citizens" Project

SUN Ya-sai

(China Institute for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Beijing 100007, China)

Key words: Ind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mmigration policy; cultural identity; policy on diaspor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India's policymaking on citizenship granted to its diasporic communities.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India, overseas people of Indian origin may be treated as Indian nationals, but are in practice prohibited from holding dual citizenship. Equipped with the ideology of "Greater India" and India's unique colonial heritage, this innovative policy enables an Indian cultural citizenship to be constructed, which may function beyond sovereignties and national borders. Useful references from India may be applicable for China to adopt in its govern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根据《2024世界移民报告》, 印度是世界第一大移民来源国。在世界前十大移民走廊中, 印度—阿联酋位居第四, 印度—美国和印度—沙特分别居第六和第九。^[1] 海外印度人分为两类群体: 一类是侨居国外、仍然保有印度国籍的印度人, 即印度侨民 (Non-Resident Indians, NRIs); 另一类则是有印度血统但具有外国国籍的印度人, 即印度裔外国人 (Persons of Indian Origin, PIOs)。根据印度外交部数据, 2025年, 海外印度人总数约为3542万人, 其中, 印度侨民总人数约为1585万人, 占海外印度人总数的45%; 印度裔外国人总人数为1957万人, 占海外印度人总数的55%。^[2] 印度也是全球接收侨民汇款最多的国家。2023年, 通过正规渠道汇往印度的侨汇达1195亿美元, 比排名第二的墨西哥(662亿美元)高出一倍多。自2010年以来, 印度的侨民汇款增长了120%, 在2023年占印

[收稿日期] 2025-05-16; [修回日期] 2025-12-22

[作者简介] 孙亚赛, 女,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国际移民、华侨权益保护。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资助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野下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变迁研究”(24SGC114)之阶段性成果。

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3.4%。^[3]

回溯印度海外移民政策的发展历程，20 世纪 80 年代前，印度对海外移民持放任态度；90 年代经济自由化后，政府政策转向积极吸纳移民资源；21 世纪初，则将海外印度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核心，形成系统性的海外移民治理框架。从 1999 年印度裔外国人卡（Persons of Indian Origin Card，简称 PIO 卡）的试行，到 2003 年双重国籍修宪的失败，再到 2006 年印度海外公民卡（Overseas Citizen of India Card，简称 OCI 卡）的启动，最终在 2015 年完成印度裔外国人卡与印度海外公民卡的制度合并，印度构建了一套独特的跨国公民身份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在宪法禁止双重国籍的刚性约束下，满足海外印裔对母国身份认同与权利保障的双重诉求。这对同为发展中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且拥有庞大的华侨华人群体的中国来说，具有借鉴意义。本文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比较研究、法律阐释等方法，系统分析印度“海外公民计划”的制度创新与理论价值，旨在探索印度如何通过法律规避实现制度创新，以期为我国的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提供借鉴。

一、理论梳理与文献回顾

跨国移民治理经历了从古典理论—结构主义—跨国主义—多层级治理范式的发展历程。其演进脉络显示，跨国移民治理已从简单的线性管控走向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多层次制度互动，并在全球化与地方化张力中寻求权利保障与发展效益之间的动态平衡。其中，古典理论强调移民行为的个体理性选择，国家在移民过程中角色较弱，治理手段以控制为主，认为移民的动因是由来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经济、社会差异所驱动。结构主义将移民置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理解，强调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需求，^[4] 国家成为维持不平等结构的工具，移民政策常服务于资本利益。跨国主义关注移民跨越国界形成的社会网络与身份认同，移民同时嵌入多个社会体系，国家角色从压制转向管理，开始承认并利用移民的跨国联系。多层级治理强调移民治理涉及全球、区域、国家、地方等多个层级，非国家行为体，^[5] 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城市网络等作用日益提升，国家作为协同者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手段提升治理效率与包容性。

表 1 跨国移民治理理论的比较

维度	古典理论	结构主义	跨国主义	多层级治理
时间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60 年代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	2000 年至今
分析单位	个体	经济系统	社会网络	全球—地方联动
国家角色	缺席	压迫者	管理者	协同者
核心驱动力	经济理性	资本扩张	社会资本	技术 / 制度创新
治理目标	控制流动	维持剥削结构	管理跨国联系	优化流动效益
代表理论 / 学者	推拉理论 (Lee)	历史—结构主义 (Sassen)	跨国社会空间 (Faist)	多层级治理 (Hooghes & Marks)
治理工具	边境管控、签证制度	劳工配额、临时工制度	双重国籍、侨民政策	数字治理、区域合作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现有的研究看，涉及印度海外移民治理的学术论文数量并不多，现有研究多从历史脉络的梳理、政策现象或制度设计的描述等方面展开。例如，张秀明细致梳理了海外印度移民的历史与分布、

与印度的联系及其对印度的影响、印度的侨务政策及其启示。^[6]丘立本从历史的维度介绍了印度海外移民的分布、侨务工作的发展以及海外印度人事务部的工作开展情况。^[7]康晓丽概述了印度移民的历史变化和海外印度人政策及其对我国完善侨务政策的启示。^[8]路阳从比较视野分析了印度和菲律宾海外移民政策的异同及启示。^[9]贾海涛详细介绍了印度海外印度人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背后的民族观。^[10]张梅从大国战略视角分析了印度侨务资源的特点、侨民战略及其成效。^[11]林海文等聚焦印度移民回流政策，以1998年为分界比较了两个阶段的政策变迁。^[12]但是，现有研究缺乏对制度设计内在逻辑的深度分析。本文旨在以印度海外移民治理为视角，揭示其如何将移民资本转化为国家发展动能，并探索移民母国责任的边界。

对于印度的海外移民治理政策，核心分歧在于民族认同的建构困境。制度创新派认为，“海外公民计划”建立“弹性公民身份”，是宪法约束下的智慧突破；“寻根计划”强化了文化纽带和新生代认同；政府机构改革保障了政策的执行。后殖民批判派则认为，“想象共同体”缺乏历史根基；^[13]地缘排斥制造“侨民等级制”，激化侨民冲突；政党轮替导致政策反复。基于此，本文尝试阐释的议题主要有：一是印度海外移民治理的伦理框架。应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前者体现为侨汇、技术等，后者体现为公平、文化多样性等。例如，印度忽视对海湾劳工的权利，对欧美精英则采取倾斜政策，暴露其政策的伦理缺陷。二是制度适配原则。需明确印度经济文化权开放成功而政治权开放失败的原因。同时，需警惕制度弹性阈值，即当政策触及主权核心时会导致反弹加剧。

二、政策演进与内在动力

从地域分布和数量来看，海外印度人人数在100万以上的国家有8个（见表2），其中美国的印度人最多，人数达541万人左右。截至2023年，有超过290万印度移民居住在美国。自1960年以来，美国的印度裔人口持续且大幅增长，其中2000—2023年期间的移民数量最多。美国也成为继阿联酋之后印度人青睐的第二大全球移民目的地。印度人是美国第二大外国出生群体，仅次于墨西哥。整体而言，美国的印度移民普遍具有高技能和高收入，绝大多数拥有学士学位或者更高学历，而且他们成为美国公民的可能性也更高。这种状况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美国的印度移民人数较少且多为低技能工人。

表2 2025年海外印度人人数超过100万人的国家

国家	美国	阿联酋	马来西亚	加拿大	沙特阿拉伯	缅甸	南非	斯里兰卡
人数/万人	541	357	291	288	246	200	170	160

资料来源：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Population of Overseas Indians”, <https://www.mea.gov.in/population-of-overseas-indians.htm>, 2025年4月14日浏览。

这些分布特征并非自然形成的结果，而是与印度政府长期以来的海外移民治理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本文将进一步梳理印度海外移民治理体系的阶段性变迁，从而揭示其政策设计如何逐步回应并塑造海外印度人的结构、流向与影响力。

（一）政策演进的阶段性特征

印度作为最大移民来源国，其海外移民政策经历了引入、过渡和定型的发展阶段，并呈现典型的阶段性特征。

1. 引入阶段（1947—1998年）：计划经济下的单向利用

由于历史、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原因，印度独立初期政府对海外印度人采取“不干涉”政策。^[14]印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其缺乏动员和利用海外印度人的经济动力。1955年颁布的《国

籍法》明确禁止双重国籍，割断了与海外印度裔的法律纽带。印度沿袭英国殖民时期的《移民法》，视移民为劳动力输出渠道，未建立专门管理机构。1983年，印度颁布了《移民法案》(Emigration Act)，重在规范海外雇佣招募制度，维护海外印度劳工的基本权益。^[15]

直至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移民回流政策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政策工具主要有：1958年的高级研究协会项目(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ship)、1980年的海外侨民回国传授技术计划(Transfer of Knowledge Through Expatriate National)、1990年的海外印裔科技专家联络计划(Interface for Non-Resident Indian Scientists and Technologists Program)、1997年的拉马努金奖金计划(Ramanujan Fellowship)。^[16]此阶段移民回流政策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象选择性。政策仅面向高技能人才，即科学家等知识精英，且申请需经严格审核。二是机构和政策碎片化。侨务职能分散于多个机构，缺乏统筹部门，政策之间也没有承接关系。三是成效局限性。政策以经济手段为主，缺乏相应制度配套，导致海外印度人回流成本高、意愿度低。此阶段的政策本质上是对人才流失的被动应对，反映了印度官方的“划清界限”思想，即“入籍外国者应融入当地社会”。

2. 过渡探索阶段(1999—2014年)：法律规避术的制度创新

瓦杰帕伊政府为修宪做准备，于1999年3月公布实施印度裔外国人卡，为印度裔移民提供出入境、居住、工作等便利。该卡于2002年降低申请门槛，2014年申请费用从1000美元降至245美元(1.5万卢比)，18岁以下儿童减半，这是吸引普通印度裔群体的重要转折。印度裔外国人卡也存在一定缺陷，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身份排斥性，其出于地缘安全考虑，将巴基斯坦等7国印度裔排除在外；二是成本门槛高，初始收费1000美元，费用较高导致申请率偏低。

2003年，印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18个国家的印度裔持有双重国籍。此举因两大矛盾而流产：一是法律平等性遭质疑，该政策仅惠及欧美发达国家的移民，被斥为“势利歧视”；二是政党更迭，2004年国大党上台后立即废止该计划，暴露了政策缺乏跨党派共识。此阶段的核心矛盾在于国大党与印人党的理念冲突。但党派博弈催生了制度妥协，国大党否决印人党的双重国籍政策后，出台了“海外公民计划”，构建“双轨制”过渡方案。“海外公民计划”成为党派博弈下兼顾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折中方案。“海外公民计划”在2006年海外印度人大会上启动，回应了来自北美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海外印度侨民关于双重国籍的长期诉求，也兼顾了政府对实现海外印度人愿望和期望的承诺。但“海外公民计划”不应被误解为双重国籍政策，因为它并不授予政治权利。^[17]

3. 定型发展阶段(2015年至今)：弹性公民权体系的成熟与发展

2015年，莫迪政府拓展为统一方案，即合并印度裔外国人卡和印度海外公民卡，标志着印度海外移民治理制度的定型。印度海外移民治理体系的创新性在于：第一，构建法律虚体，通过“海外公民”等非标准法律身份，在主权框架内创设弹性空间；第二，权利模块化设计，将公民权解构为政治、经济、文化模块，针对侨民需求精准配置；第三，程序合法，印度海外公民卡绑定外国护照使用，确保法律形式合规；第四，终身权利保障，印度海外公民卡突破印度裔外国人卡的15年期限，享有永久居留权，免签证出入境；第五，代际包容扩展，海外公民范围覆盖1947年印度独立前后移民的四代后裔。^[18]

从权利角度来看，印度侨务政策构建了一个“伞状权利包”：“伞面”代表文化认同，通过海外印度人节、^[19]全球印度知识网络项目(Global Indian Network of Knowledge)、^[20]了解印度计划(Know India Programme)、高级研究教师交流计划(Visiting Advanced Joint Research Faculty)等加强海外印度人的文化认同。“伞骨”代表经济、文化、社会等权利，赋予海外印度人终身免签、无期限居留、投资国民待遇、教育权等。“伞柄”缺失，代表政治权利被排除，例如明确排除选举权、公职权等以保障国家安全。“伞轴”代表程序保障，印度海外公民卡可以终身免签且配套外国护照使用，确保程序合法。从实际成效来看，2011—2020年，具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的印度籍移民回国人数从4113人上升至14184人。截至2022年1月31日，印度政府已发放406.8万张印度海外公民卡。^[21]

（二）内在动力

印度海外移民的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动能激活，是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系统性重构的成功范例。

1. 经济环境改善提供基础拉力

印度国内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发展潜力提升是海外印度人回流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动因。推动印度海外移民治理政策发生实质变化的是1991年正式启动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此后，印度的经济增速明显加快，尤其是IT业持续扩张。1990—2003年，印度IT产业年均增速达40%，这与海外印度人的推动密不可分。2000—2004年，仅回流印度的IT专业人才就达2.5万人，^[22]且大多集中在班加罗尔的科技园区。

2. 宪法框架下的制度创新

印度海外公民卡并非一个简单的签证优惠政策，而是一场深思熟虑的宪法框架下的制度创新。它通过“概念置换、实质赋权、程序合法”这三重精巧的法律技术，在宪法的刚性约束下，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功能性的“准公民权”体系。其一是概念置换，将“公民权”（Citizenship）替换为“海外公民权”（Overseas Citizenship），后者实为“终身签证特权”，回避与宪法双重国籍规定的冲突。其二是实质赋权，持卡人享有90%国民待遇，即剥离政治权利，保留经济、文化、社会等权利，不是国籍却实现了国籍的大部分功能。其三是程序合法，印度海外公民卡须与外国护照绑定使用，印度使领馆仅在护照签注，确保法律形式合规。印度海外公民卡实现了情感认同、利益吸引与法律合规的三者统一，其设计和实践对全球移民治理和公民权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政策制定遵循需求导向原则

在全面了解海外印度人需求的基础上，印度政府海外移民政策坚持需求导向、靶向发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方面，根据移民时间，印度政府将海外印度人分为老移民和新移民。前者主要指19世纪契约劳工移民的后裔，其中部分人已经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领域影响力，特别是某些国家的印度裔官员，可以推动印度的对外合作与发展，是印度可以依赖的重要战略资源。后者则主要是指20世纪后的移民，尤其是高技术移民，其中一些人已经成为居住国的科学家、技术人才、企业家。针对这一群体，印度政府则重在获取他们的知识、技能、资源和市场，进而推动印度的发展。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类型的诉求调整移民政策。例如，印度与海湾国家、马来西亚签订劳工福利保障协定，与欧洲国家签订双边社会保障协定、人力资源流动合作协定等。^[23]

4. 机构职能整合，形成综合治理体系

2000年，印度建立海外印度人高级委员会，负责统筹制定政策，直接对总理负责。2004年，“海外印度人事务部”（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 Affairs，简称MOIA）全面负责海外印度人事务，标志着政策全面升级，形成涵盖法律、行政、经济、文化的综合治理体系。2015年，印度实施“最小化政府”改革，该机构并入外交部。海外印度人事务部统筹原属外交、劳工、财政等部门的移民事务，有效改善了过去政出多头的局面，有助于移民管理工作的集中有效开展。此外，印度政府还注重与工商、妇女、青年等民间团体、国内外高校的合作，注重运用外包、代办等市场经营手段开展工作。基于此，MOIA可以更加专注于全局性、前瞻性和政策性的研究工作。^[24]

5. “大印度”民族观的意识形态构建

印度“海外公民计划”的深层动力源于印度独特的民族建构理念。一是文明共同体想象。前总理瓦杰帕伊宣称每个海外印度裔都代表印度文明，学者帕朗嘉毗提出“超越国界的大印度”。^[25]二是殖民遗产的再利用。英属印度统一管理的历史，使印度自视为“南亚文明唯一继承者”。三是去领土化认同。政府将海外印度裔统称为“印度母亲的儿女”，弱化其出生地政治属性。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这种激进民族主义并未引发国际抵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原因在于：第一，目标群体特性。海外印度裔大多居留欧美发达国家，母国政策易获接纳。第二，权利实质有限。海外公民身份未赋

予政治权利，不挑战居住国主权。第三，后殖民话语优势。国际社会对前殖民地国家的文化寻根持宽容态度。

三、理论启示：全球化时代海外移民治理的新范式

（一）三类国家政策范式对比

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治理面临的核心矛盾是主权国家刚性法律框架与侨民柔性身份诉求的张力。各国的发展目标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其海外移民政策也相应分化。美国等发达国家重在发挥海外移民的杠杆作用，以增强其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以色列作为次发达国家，其政策路径经历了从单向索取到双向互惠的演变；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借助海外移民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建设目标。其主要区别见表3。

表3 三类国家海外移民政策对比

维度	发达国家	次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代表国家	美国	以色列	印度
政策目标	全球影响力扩张	技术回流优先	经济建设中心
政策工具	侨民接触联盟	《回归法》、双重国籍	海外公民身份
权利配置	政治经济捆绑	宗教文化捆绑	经济文化捆绑
地缘排斥	无	无	排除7国公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中印模式的差异

同为发展中大国，印度与中国都拥有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的海外移民群体，且这些群体与各自母国保持着紧密联系。印度在海外移民政策的发展上曾滞后于中国，并积极借鉴了中国的侨务政策经验，但鉴于两国在历史文化及政治制度上的显著差异，印度的借鉴并非简单模仿，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吸收与转化。印度构建了独特的政策模式，其成功经验也为中国完善海外移民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从模式选择上看，中国采用“血统义务”模式，印度采用“文化公民”模式，两者的区别见表4。

表4 中印模式比较

维度	中国“法律义务”模式	印度“文化公民”模式
法理基础	《国籍法》第9条刚性条款：“定居外国自动丧失国籍”	宪法禁止双重国籍但创设法律虚体（海外公民身份），以终身签证权实现准国民待遇。
权利配置	二元分割：华侨（公民权）与外籍华人（有限便利）	权利解构：经济文化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利解绑。
身份包容	血缘认证严格：需证明三代内直系亲属为中国公民	文化认同优先：四代内曾祖父母为印裔即可申请印度海外公民卡；模糊国籍界限，构建“大印度”认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印度范式的启示

印度海外移民治理通过制度重构将离散的移民资源转化为国家发展的系统化支撑。印度海外公民卡的本质是后殖民国家利用文明话语权，在宪法刚性约束下构建弹性公民权体系的成功实验。其

构建了去政治化的民族共同体，通过精巧的法律规避术与“大印度”民族观的互构，解决了双重国籍的宪政困境。这一模式的成功得益于三个特殊性：后殖民国家的文明话语权、海外移民的西方主导分布以及权利设计的非政治化。对中国而言，印度的发展模式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其启示不在于模仿机制，而在于思考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兼具文化包容性与法律安全性的侨务政策框架。

一是研究法律规避的本土化应用。在不违背现行国籍法的前提下，赋予海外移民在出入境、投资、定居、教育等方面的便利，从而广泛吸纳和利用海外人才、资金与文化资源，系统提升国家软实力与全球影响力。

二是建立梯度精准赋权政策体系。印度海外移民政策的重要经验之一，在于敏锐识别移民群体的内在异质性，并基于不同类别，如普通劳工、高科技精英、商业投资者及不同代际的移民，实施目标明确、措施精准的政策。我国可借鉴该思路，推动我国侨务政策从“粗放普惠”向“精细区分”转型，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效益最大化。

三是实现文化认同的有效转化。文化理解包含了文化认同和跨文化能力。^[26]实现文化认同的有效转化与深化建构，是拓展海外侨务工作、涵养侨务资源的重要路径。与法律身份这一刚性纽带相比，文化认同具备更强的情感渗透力、社群凝聚力和代际延续性。因此，应以开放姿态推动跨文化、深层次的中外文明对话与互鉴，^[27]系统构建具有包容性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认同体系。

四是重视数字侨务的技术赋能。数字侨务不仅是服务手段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现代化转型，已成为全球移民治理的主流趋势。我国可积极构建面向海外移民的数字化服务平台体系，推动侨务工作从传统线下模式向线上线下融合模式转变。

[注释]

- [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4”,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4046958?v=pdf#files>, 2025年3月1日浏览。
- [2]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Population of Overseas Indians”, <https://www.mea.gov.in/population-of-overseas-indians.htm>, 2025年4月14日浏览。
- [3] Madeleine Greene and Jeanne Batalova: “Indi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24年11月8日,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indian-immigrants-united-states>, 2025年2月14日浏览。
- [4] S. Sassen,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86-188.
- [5] A. Sbragia (eds.), *Euro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Policymaking in the New European Community*, Washingt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92.
- [6] 张秀明:《海外印度移民及印度政府的侨务政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 [7] 丘立本:《印度国际移民与侨务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 [8] 康晓丽:《论印度的海外印度人政策及其对中国侨务政策的启示》,《南亚研究》2013年第1期。
- [9] 路阳:《印度和菲律宾海外移民政策比较及启示》,《东南亚纵横》2016年第1期。
- [10] 贾海涛:《印度“海外公民计划”及政策新变化》,《南亚研究季刊》2020年第2期。
- [11] 张梅:《大国梦之下的印度侨民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2期。
- [12] 林海文、刘宏松、娄劲男:《印度移民回流政策的发展及其驱动因素》,《世界地理研究》2024年第2期。
- [13] Parvati Raghuram, Ajaya Kumar Sahoo, Brij Maharaj and Dave Sangha, *Tracing an Indian Diaspora: Contexts, Memories, Representations*, SAGE Publications Pvt. Ltd, 2008, p.1.
- [14] Gabriela Tejada, Uttam Bhattacharya, Binod Khadria and Christiane Kuptsch: “Indian Skilled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https://content.e-bookshelf.de/media/reading/L-2680276-40155fcf8d.pdf>, 2025年3月10日浏览。
- [15] Ajay Kumar Dubey, *India Diaspora: Global Identity*, Delhi: Kalinga Publications, 2003, pp.11-22.
- [16] 林海文、刘宏松、娄劲男:《印度移民回流政策的发展及其驱动因素》,《世界地理研究》2024年第2期。

- [17]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Overseas Citizenship of India Scheme”, <https://www.mea.gov.in/overseas-citizenship-of-india-scheme.htm>, 2025 年 3 月 18 日浏览。
- [18] 贾海涛:《印度“海外公民计划”及政策新变化》,《南亚研究季刊》2020 年第 2 期。
- [19] 张严冰、黄莺、司文:《印度吸引海外印裔人才回流的措施和成效》,《国际研究参考》2014 年第 11 期。
- [20] 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 Annual Report 2008–2009, pp.42–44.
- [21]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Overseas Citizenship of India Scheme”, <https://www.mea.gov.in/overseas-citizenship-of-india-scheme.htm>, 2025 年 3 月 18 日浏览。
- [22] McKinsey and Company,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nd Service Companies, Extending India’s Leadership of the Global IT and BPO Industries: NASSCOM–McKinsey Report 2005, Noida: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nd Service Companies, 2005.
- [23] 康晓丽:《“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典型侨务资源大国侨务政策比较及对我国启示》,《八桂侨刊》2020 年第 3 期。
- [24] 丘立本:《印度国际移民与侨务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
- [25] Makarand R. Paranjape, *In Diaspora: Theories, Histories, Texts*, New Delhi: Indialog Publications, 2001, pp.161–170.
- [26] 尹晓煌、臧小佳:《正在书写的“文本”:全球人文视野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再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10 期。
- [27] 尹晓煌、汪学冰:《美国华人文学中的中华文化书写与身份建构》,《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于丹]

· 书讯 ·

《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 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出版

由厦门大学沈惠芬所著的《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 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一书于 2025 年 7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多种研究资料、田野调查及有关研究基础上，结合历史学与社会性别研究方法，考察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东南亚跨国迁移与中国社会变迁下福建移民家眷的生命史，探寻近现代男性跨国迁移、中国社会发展及普通民众跨国交往过程中留守女性的人生历程、留守生活及其与婚姻、家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华侨华人的多样关系，从社会性别角度反思华侨华人史、华人跨国迁移史的历史书写。